

万松浦书院设立之初，曾经考察过很多地方落脚：两处海边，一处海岛，还有一处在鲁西平原。这些地方今天看来各有利弊。西部平原显然离传统文化根脉更近，民族文化的根基在那儿。但是海滩美丽，海湾漂亮。鲁东南的一处海湾也有很多松林，缺点是地势低洼，每隔一些年就会有风暴潮来袭。

找来找去，最后选址在龙口湾以东的这个地方。

现在的龙口市属于秦始皇时期郡县制的古黄县，那时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黄县是古代东夷时期莱子古国最重要的地区，有一个说法，认为这里就是齐国将莱子国逼迫东迁的国都。由此往东南二十多华里有，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归城故城遗址”，就是考古人士说的东莱古国的都城。一些最有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物，大量来自这一带。

可见这里的文化渊源很深。今天的龙口从地图上看就像一支犄角的小小分叉，而这支犄角由渤海湾伸出，直向着更辽

阔的海域——黄海伸去。而这支犄角的分叉是探向了相反的方向，好像格外留恋渤海的一次回望似的，这就形成了龙口湾。龙口全境由面积大致相当的三部分组成：山区、丘陵和平原。这三个部分自南往北依次展开。最北边是胶东丘陵北部的一片冲积平原，离海岸大约七八华里的一片，是海冲积平原，也就是海浪海风海沙的合力，把冲积平原压在了下边，再次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沙粒，当地人叫做“大沙滩”。

据书上记载，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这片大沙滩以及四面还是无边的树林。那是一片自然林，稀疏相间，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一直绵延到很远。古代讲到蛮荒，说“人民不胜鸟兽虫蛇”，听着有趣好玩，实际上那时的日子是很难过的。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个边缘地带的情形，显然是极端荒凉的。直到四十年代中期，这里还是人烟稀少，几乎没有太大的村落。比如离这里较近的一个村子算是很大的了，它的名字叫“灯影”，可能是当年有人往北部荒野走，远远看见有闪烁的一点灯火吧。那时林子里大概只有零星的居民，是渔人或猎人，后来才一点点繁衍成今天这样的自然村。

记忆中这个地方全是自然林，树木品种很杂，长得最大最多的有橡树和白杨，有洋槐和合欢树、柳树等。松树是五六十年代植起的人工林，为了防风，它的位置更靠近大海。自然林是最诱人的，树种杂，分布得没有规律，神秘极了。五十年代末这里还是一片蛮荒面貌，是典型的边地荒原。那时来往出没过的是猎人、采药的人、打鱼的人，林子里一些弯曲小路就是他们踩下的。这些小路纵横交织，形成了迷宫。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子开始缩小，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一般人眼里它还是无边无际的大。这里先是成立了一个国营林场，再后来又有了一个国营园艺场。大约也就是这时候，在国营林场的经营下，开始了近海防风林的栽种，这就有了几万亩的黑松林——它与无边的自然林混到了一起，算是人们对原来那片缩小的林子的一种补偿吧。

万松浦东边紧邻的就是港棠河，现在看它像一条大水渠一样狭窄，可是在七八年前还是一条中型河流的模样，经常可以看到渔人在上面撒网。而在古代它是很宽的，河床大约有一百五十米，里面有很多航船，河湾就是一个大码头。现在从这里往南不远的“港口棠家村”，通常简称为“港棠村”，就是以这个河头码头取的名字。

从这个海港再往东，不远处有个村落叫“黄河营”，就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海军军营遗址，在黄河入海口，是北方最重要的海军营地。现在那里时常还会挖出很多东西，当年铺路的石板，车辙磨进了很深，如今都运到市博物馆铺了巷子用。这个营地可能要早于威海的刘公岛，是半岛地区最早的一个海军营地。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的丛林与河流一起萎缩。现在，从书院往四下望去，会发现四周都是高楼。原来的林子没有了，不要说几万亩，连一万亩都找不到了。说起来没人相信，这片林子消失的速度不是几年，也不是几个月，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据当时住在书院里的人说，只听到一夜的呼呼隆隆声，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无边的林子就没有了。

城市化的速度真让我们惊讶：像变戏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楼房，十层二十几层，工业区、大烟囱、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国际游艇码头，全是对西方的盲目跟进，是很蹩脚的模仿。这一切正以更快的速度往前推进，与其他地方一样，其实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里更像一个缩小了的、经济转型之后的东部地区面貌。单是围绕书院四周，一切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想象一下六七年前，想象那片无边的林子，一条大河，河的入海口——那叫“浦”；入夜后四周全是林子，漆黑一片，只有书院灯火闪烁，书声朗朗。

那时我们多么爱惜这片林子，当年建书院就因为害怕破坏树林，才特意找了河边这块荒地，因为这里树木稀疏。书院里面的小路，都是当年猎人和渔人踩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在原路上铺了碎石而已。小路中间如果有一棵树，我们也一定要保留下来。建房舍时，如果墙基线上有一棵松树，我们就会改变原来的图纸，让墙凹进去一块儿，只为了让这棵树像原来一样生长。

可是开发商在一夜之间就把几万亩林子打扫得一干二净了。

对比一下也就明白了许多。历史，现实，许许多多也就可以明白。这好像是一个象征——历史进程的象征，历史规律的象征。

所以，现在的书院就成了这个样子，它被包围在一片水泥丛林之间了。2003年9月书院举行了开坛仪式，其实2002年就开始了运作，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年的路程。这十年里，书院有过许多学术活动，境内外很多学者来都这里讲学游学，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叶兆言

用美女形容吴贻芳先生不太合适，现如今这称呼成了女性的代名词，冒昧借用一下也无妨。我对吴贻芳一向敬佩，受家庭影响，长辈偶尔提到她，总是啧啧赞赏。我在还没弄明白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时，就已经是粉丝了。

吴贻芳出生在武汉，说到武汉妹子，很容易让人想起网球运动员李娜的强悍。吴贻芳其实很文绉绉，一个标准的女书生，这大约和江南的婉约有关，她所有的教育都在江浙完成，读过的学校有杭州弘道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子学堂、苏州景海女子学校。再以后就是读金陵女子大学，很牛很有历史的一所学校，第一届毕业的只有五个人，吴贻芳是其中之一。

吴贻芳与毛主席他老人家同年，说起出身，也只能算小康。十六岁时，父亲因为一笔公款亏空，做了上司的替罪羊，跳江自尽。隔一年，升学无望的哥哥也自杀了，病弱的母亲悲伤而亡，姐姐受不了这打击，在母亲下殓前夜自缢。短短两年，竟然有四位亲人离世。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非常人所能忍受。

不一般的人有不一般的经历，说起吴贻芳，当然更多的是辉煌。她是留美的生物学博士，民国的第一小姐。当年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民国第一夫人是宋美龄，第一小姐的头衔给了她。吴贻芳是妇女界的杰出代表，有着太多太多的风光。说句大白话，她就像金子一样，搁在哪里都会闪光。民国时，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还是了不起。

我的一个朋友周和平兄对吴贻芳很有研究，大学毕业，分配在统战部，因为工作原因，开始与吴贻芳老人打交道。从那时起，他就处处关心，仔细收集资料，说起她的故事如数家珍。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晃三十年，写了一部关于吴贻芳的书，书名叫《永远的吴贻芳》，刚出版就再版了。不读不知道，读了才知道，许多细节不为人知，因为这本书而曝光。譬如一张去美国的报销单，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87岁的吴贻芳去美国领“智慧女神奖”，国家给了3万美金公款，她带着两个人，在美国住了65天，最后只用了3千多美金。为什么呢，因为她非常节省。在美期间，总是住最普通的旅馆，要不就是住在朋友或过去的学生家里。

节俭是民国美女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也许与物质匮乏有关，也许与战乱有关，当然更与知识储备分不开。金钱对于吴贻芳这样的人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自从成名之后，她显然就没有缺过钱，然而钱永远是身外之物，一点都不重要。



民国的
美女



万松浦讲稿之一

万松浦地理

□张炜



读博的执着与艰辛

□赵勇

读着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不禁感慨，一般读者读这本书，或许只是读到了那些来之不易的材料，绵密细致的分析，但我却总是从书里走向书外，去想作者这个人。

我与钱振文是研究生时的同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同在山师大中文系读书。他低我一届，学的则是现代文学。专业不同，按理说走得不可能太近，但那个年代，研究生还没有“批量生产”，每个专业的男男女女都屈指可数。人少，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下子就熟悉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有二：人比较“闷”，喜欢闷头读书。

1990年，我毕业后回到了山西。一年后，钱振文毕业去了河北。整个90年代，我在长治教书，

钱振文在石家庄办报。我们再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相互走动了。

新一轮的走动始于2003年9月。此前他已告诉我，说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先生的门下，这又让我感慨。我觉得得早，出来得晚。没想到的是他终于也觉悟而且出来了，只是出来得比我更晚。刚来北京不久，他就连续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见面的心情非常迫切。而从他电话里听出来的意思，他并不是要与我叙旧，而是急于想跟我聊一聊他的毕业论文选题。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那是十年前的9月中旬。当时我蜗居在北师大校园的一个“团结构”里，设备简陋，便备一瓶白酒，拌两个凉菜，煮一锅面条招待他。他也不含糊，把一盆（我当学生时用的饭盆）面条吃得山穷水尽，且大呼好吃。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聊天的具体细节已荡然无存，倒是他

的吃相凶恶让我记忆深刻。

就是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了博士论文选题给他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他说他在新闻界晃荡多年，重走学术之路似已生疏，便想尽早动手，找到一个好选题。他还说他读了两本文化地理学的书，想试试大众文化能不能做。他大概知道我刚与大众文化理论较过劲，就想让我指点迷津。

12月，我们又有一次电话，他在电话里依然是在焦虑选题。他想做沈从文，选择的角也依然是文化地理学。那个学期，他好像一直沉浸在文化地理学的意绪里，所有的选题大都与它有关。他的导师程光炜说：“他曾与我讨论过研究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似乎要投入对资料的阅读、发掘、整理，继而发现一条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路径。”这不也是文化地理学的思路吗？

然而，这种思路最终还是被

他的导师“枪毙”了。在导师的建议下，他一头扎到了《红岩》里，居然做得津津有味。导师说：“他马上行动起来，先是与我的朋友、重庆师范大学的周晓风教授联系，自费去重庆实地了解、考证相关资料，访谈了不少小说写作时候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接着又到小说《红岩》责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故老编辑张羽生家附近的小旅馆中‘潜伏’了半个多月，运用记者善磨的能力，说服了张先生的夫人，每天去她家里，在张先生遗留的手稿、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这使他收获颇丰。”

这段文字呈现了钱振文做这篇博士论文挖材料的执着与艰辛。我还可以进一步提供的细节是，有一段时间，我不时会在北师大主楼巨大的顶棚下与钱振文不期而遇。他斜挎书包，形销骨立，目光游离，状若幽灵。问他为何在此游荡，他说刚从中国

电影资料馆查资料回来。他在电影资料馆泡了多长时间，我不得而知。但他那种做博士论文的表情我是太熟悉了，因为我也曾神情恍惚过，灰头土脸过。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做得辛苦，收获颇丰，钱振文在后记中才有了他的经验之谈：“最近几年，时有攻读中国当代文学学位的学生和我切磋学问之道，我总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他们探讨他们研究对象的现场何在和如何进入这些现场，而不是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概念。我觉得，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种脑力劳动，但也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体力劳动。”

做论文是体力劳动的说法许多年前我也听说过，但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做论文的人可能连图书馆都懒得去了。钱振文能说出这番话来，说明他的论文做到了一个境界。